

# 《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浅析（中文）

櫻井 智美

## 目 次

- 一 关于避讳
  - （一）“今上皇帝”是谁？
  - （二）元代的避讳
- 二 元代的韵书与类书
  - （一）《古今韵会举要》、《韵府群玉》与《礼部韵略》
  - （二）元代的《礼部韵略》的流行与科举制度

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变迁,很多学者将科举制度作为维持历代官僚制度的基本因素,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主要由中国的研究者根据以《元史》为主的各种元代史料中记载的科举规定,致力于解明元代科举实施的具体情况。在日本国内,虽然学者们认为科举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与科举实施的具体情况相比,学者们更重视蒙古时代科举的特有现象。比如,及第人数甚少而实施回数不多,蒙古、色目人受到优待,以及科举是如何恢复的等问题特别受到重视<sup>(1)</sup>。即使日中两国学者在元代科举研究方面存在者以上那样的区别,但是近年从不同的角度对元代的科举进行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基础性论著。首先要提及的是萧启庆所作的进士及第者的名单。为了明确元代科举制度在整个官吏任用制度中的作用,萧氏的名单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起点<sup>(2)</sup>。陈高华和森田宪司各自进行了《元进士考》

<sup>(1)</sup> 关于元代科举的研究状况,请参看森田宪司:《元朝の科举资料について—钱大昕の编著を中心に—》和陈高华:《<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的一点补充》。

<sup>(2)</sup> 萧启庆于1999年首先发表了《元延祐二年与五年进士辑录》,随后又发表

和《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的研究。这些元代资料虽然已经被介绍给学术界,但是对这些史料本身及其价值所在尚没有展开基础性的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资料<sup>(3)</sup>。同时,桂栖鹏出版了《元代进士研究》,本书似乎是关于元代科举的第一部专著。此外,应该提及平田昌司的《科举制度与汉语史》。该项研究是从中国科举制度史的角度分析元代的科举的<sup>(4)</sup>。此外,还出现了关于元代科举制度中规定士大夫的知识范围的研究<sup>(5)</sup>。这种跨地域的科举研究的兴盛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各位学者提示的庞大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今后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讨论。

鉴于这样的研究状况,为了说明元代科举制度中,特别是制度的变迁给士大夫的行动和思考以怎么样的影响的问题,我最近查阅了《礼部韵略》的各种版本。我想在此介绍元代出版的《礼部韵略》,谈一谈我对这一史料的初步认识。

《礼部韵略》是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丁度等人受命编纂的韵书,作为提供给考官和举人共同遵守的审音定韵的标准。随着帝位继承时的庙讳的追加,以及官民双方的反复修订和增补,出版了各种各样的版本<sup>(6)</sup>。其中,最有名的是至今流转下来的《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sup>(7)</sup>。此外,在金朝统治下,根据景德年间(1004-1007)出版的《〈景德〉韻略》,

---

了《元至治元年进士辑录》,《元泰定元年与四年进士辑录》,《元至顺元年进士辑录》,《元至正前期进士辑录》。

(3) 两者分别探讨钱大昕《元进士考》所依据的资料,对其中的《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以下略为《三场文选》)进行了分析。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主要分析科举登第者,指出考上乡试的人们只能有一次考会试的权利等等。森田氏探讨与钱大昕有关的元代科举史料之间的关系,指出《三场文选》开头所载的《圣朝科举进士程式》的重要性(注(1)森田论文,及同《石刻资料による元代汉人知识人社会の研究》(44-61页))。宫纪子:《〈对策〉的对策—大元ウルス治下における科举と出版—》及黄仁生:《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覆》也探讨了本书。越来越从多样的角度来研究本书的价值以及其中的有关内容。

(4)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及平田昌司:《〈广韵〉与〈集韵〉—科举制度与汉语史第五》,《科举制度と中国语史》。

(5) 黄仁生:《論元代科舉與辭賦》,及宫注(3)论文。

(6) 参考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77-80页)。

(7) 原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影印本可参看四部丛刊续编。

出现了平水韵<sup>(8)</sup>。随着平水韵的南传,属于这个系统的诸韵书陆续出版,在书名中都冠以《礼部韵略》。结果,《礼部韵略》的某些刊本,不仅在南宋时代科举停止以前,在元代也一直被使用。此外,在元代考科举试时,允许考生携带进场的只有本书。这样的情况,既可以与其他时代进行比较,也可以用于考虑制度的变迁,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本稿中将主要探讨的《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以下略为《礼部韵注》)也是被称为《礼部韵略》的一种韵书。该书让我注意到《礼部韵略》不仅是语言研究资料,也是历史研究资料,在研究科举的有关课题时都值得充分利用。我在前稿中简单地介绍被称为《礼部韵略》的诸书的特征和版本等问题<sup>(9)</sup>。若干种刊本在开始部分所收录的元代的《考试程式》和《试卷不考例》是历史学研究中最有利用价值的部分。《礼部韵注》的现存刊本有三种。①内阁文库藏元统三年(1335)刊本(以下简称“元统本”)和②国家图书馆(台北)藏至正十二年(1352)刊本(至正本),都收录有《考试程式》和《试卷不考例》。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翻刻本(存4卷)缺少这一部分。本稿主要利用《礼部韵注》的元统本,探讨关于元代考试参考书的在前稿上没有充分论述的几个问题<sup>(10)</sup>。笔者对版本目录和音韵学方面缺乏专门的研究,由于才疏学浅,也许有些误会,敬请诸位读者指正。

## 一 关于避讳

### (一) “今上皇帝”是谁?

清代的考证学者钱大昕在《礼部韵注》的跋文中表明了如下观点:<sup>(11)</sup>

<sup>(8)</sup> 关于《礼部韵略》在宋代和金代的地位,见张渭毅:《〈集韵〉研究概说》(129-132页)。详细情况请见(注(6))宁忌浮著(38-41,114-158页)。

<sup>(9)</sup> 拙稿:《〈礼部韵略〉与科举》。

<sup>(10)</sup> 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浏览过属于平水韵系统的元刻本《魁本排字礼部韵注》。因为两本都没有刊记和序跋,所以无法知道出版时期和出版地等详细情况。此外,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2《经部二》著录有(后至元元年吴氏)德新书堂刊本,但由于其下落不明,本稿暂不做详细论述。

<sup>(11)</sup>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3《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

前载科举条例甚详。所列庙讳，止于英宗，而今上皇帝不名，似是泰定初刻，后来翻本，未及增添耳。

钱大昕看到至正壬辰年（十二年）一山书堂刊《礼部韵注》，认为其是泰定年间（1324-1328）所刻的翻刻本。如他指出的《礼部韵注》的开头有题为《圣朝颁降贡举三试程式》的《考试程式》、《乡试（家状式，试卷式）》、《会试》、《御试》、《试卷不考例》及《回避讳字例》。在《回避讳字例》中列举了御名庙讳。图版不是钱大昕所见的至正本，而是元统本的御名庙讳部分。这两种刊本没有内容上的区别。在御名庙讳的一览中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今上皇帝的名字不用真名，只作“御名”改行抬头。第二个是仁宗和英宗只有庙号，没有谥号。与《礼部韵注》大致相同的御名庙讳一览收录在《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和《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之中<sup>(12)</sup>。钱大昕推测没有标明的今上皇帝的御名是也孙铁木儿，即泰定帝。他判断御名庙讳一览是“泰定初刻”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御名”两个字，还有进一步考证今上皇帝是谁的必要。再说，当考虑那个问题时，不仅应该注视庙讳，也应该注意庙号和谥号的写法。

一般说来，要确定列举皇帝的庙讳御名的史料，例如“御名庙讳”是在哪一代皇帝的统治时期编纂的，并非易事。比如说，《元典章》的目录在世祖忽必烈与成宗铁穆耳的庙号和尊谥的后面，以“武宗统天继圣钦文英武章孝皇帝”、“■”、“今上皇帝”来表示三代皇帝。勿庸置疑，用这种方式表述的当然不是应该避讳的御名庙讳。无论如何，实际上三个皇帝不会在同一时期使用这些名号。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目录不是在同一时期作成的，不能不设想是分阶段完成的。此外，在《新刊韵略》中与《礼部韵注》一样收录了科举条式。其中包括有御名庙讳的一览<sup>(13)</sup>。这里列举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前的皇帝或其父亲。虽然写

<sup>(12)</sup> 《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内阁文库藏）后集卷6《学校类》，及《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庚集卷3《表笈门》（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69册，390页）。以下略为《事林广记》，《翰墨全书》。这两者的最后都没有改行抬头的“御名”。

<sup>(13)</sup> 《新刊韵略》元刊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台北）。影元抄本影印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第250册。现存元刊本的御名庙讳一览的部分，在字体上有不一致的部分，这只要看胶卷就可以辨认出是续修部分。钱大昕在为同书的海源阁藏元刊本（现在下落不明）所写的跋文（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7《跋

明今上皇帝的名字为“硕德八剌”，但是对于庙号和尊谥，只写武宗以前，而仁宗的庙号则为墨钉。从这个特征来看，该御名庙讳一览的作成时间，肯定是在决定仁宗的庙号谥号以前，似是从仁宗死去的延祐七年正月到五月之间。如果只以决定庙号谥号的时间为根据判断，那么钱大昕所提出的列举了英宗以前庙讳的《礼部韵注》是在泰定年间编纂的看法似乎没有问题<sup>(14)</sup>。但是，现在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御名庙讳一览，关于仁宗与英宗，只写庙号，不写谥号。采用了这样的写法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般来说，决定谥号和庙号应该是在同时，不会只决定其中的某一方。但庙号与谥号略有区别。前者是在宗庙祭祀先代皇帝时使用的名号，后者有时被称为“尊谥”，即是为了颂扬死者的业绩而献上的尊号。在《礼部韵注》的一览上不写谥的理由，可以说是在每个皇帝的治世固有的非常政治性的对策。这就是说，在《礼部韵注》等资料上看到的“今上皇帝”无疑就是文宗图帖穆尔，其根据是对仁宗与英宗也采用了同样的表达方法。

成宗铁穆耳逝去以后，元朝的皇位继承不是父死子继，而是以武装力量为背景的（参看略系图）。利用军事力量勉强地掌握政权的新皇帝在即位以后，彻底压制先代皇帝的势力。同时颂扬对于自己的直系祖先的业绩。有时候，新皇帝采用回复自己祖先名誉的政策<sup>(15)</sup>。比如说，宪宗蒙哥按照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和定宗贵由的例子，向自己的父亲拖雷赠送庙号“睿宗”和谥号“英武皇帝”。蒙哥的弟弟世祖忽必烈则将“英武”改谥为“景襄”，也是出于对父亲的尊敬。这种对于未即皇帝位的父亲给予庙号和谥号的方法，当然不是元代特有的。但是，在元代中期以后，由于继承皇位非常混乱，我们利用现存史料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这种具有政治目的的操纵。现在查看在元代的下行文书上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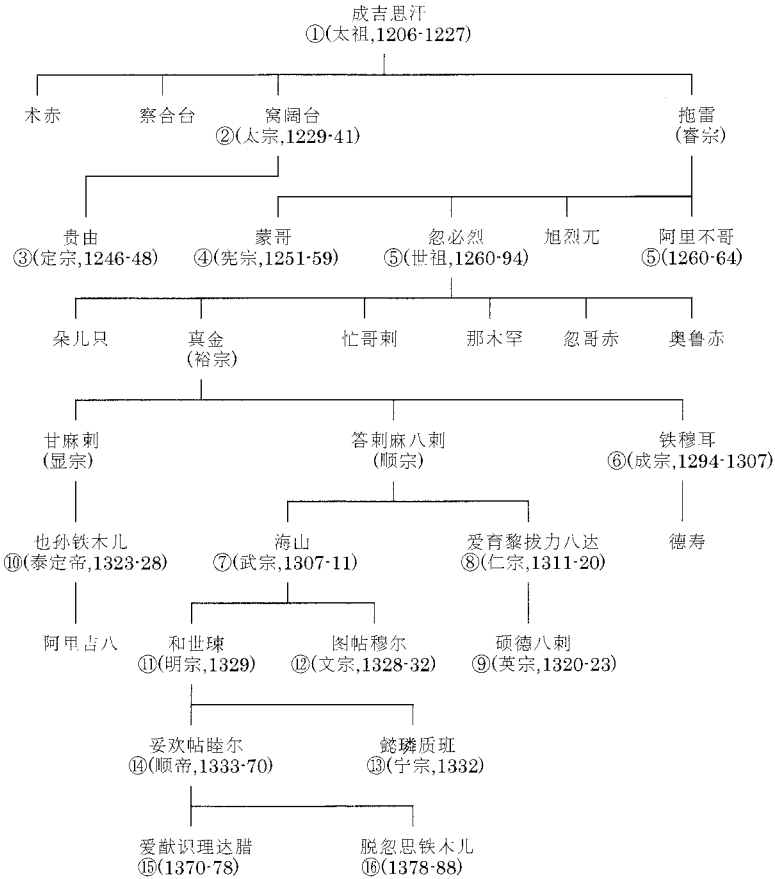
---

平水新刊韵略》中提到，海源阁藏元刊本也有同样内容的庙讳一览。从此可知这部分不太可能是在续修时改变的。

<sup>(14)</sup> 关于决定英宗的庙号和尊谥的情况，《元史》卷 29《泰定帝本纪》泰定元年二月壬申有“请上大行皇帝谥于南郊曰睿圣文孝皇帝，庙号英宗。”

<sup>(15)</sup> 关于元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史，以及对前代皇帝和前代政权的态度，请看杉山正明：《大元ウルスの三代主国—カイシヤンの夺权とその前后—（上）》（112-140 页）。

## 略系图



※ 圆圈中的数字是皇帝(大可汗)的即位顺序,括弧中所示为庙号和在位期间。

※ 人名表示依据《元史》的记载。

※ 即位顺序和在位期间等项根据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兴亡(下)—世界经营の时代》(讲谈社现代新书,1996年)中所载《チンギス・カン家略系图》。

先例时提及的历代皇帝<sup>(16)</sup>。首先,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时代的圣旨上,都有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忽必烈、铁穆耳和武宗海山的名谥。在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代,则加上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和英宗硕德八剌。在顺帝妥欢帖睦尔时代,再加上了明宗和世璠、文宗图帖穆尔和宁宗懿璘质班三个人,但是不见也孙铁木儿<sup>(17)</sup>。有意思的是至正年间(1341-1370)的命令文有意识地删去了暗杀父亲和世璠的叔父图帖穆尔的国语谥。这些政治性的表现很好地应付着宗庙制度的变化:

天历元年冬十月丁亥(笔者注:即1328),毁显宗(也孙铁木儿的

父亲甘麻刺)室。重改至元之六年六月(1340),诏毁文宗室<sup>(18)</sup>。

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宗以后不再祭祀也孙铁木儿和他的父亲甘麻刺,又可以看到妥欢帖睦尔在至元六年变更了政策<sup>(19)</sup>。

虽然在有关命令上看不出,但是根据父子关系和继承顺序,可以明白地看到先一代的政治态度。即对于和世璠和图帖穆尔来说,排挤父亲海山和自己的爱育黎拔力八达、硕德八剌父子都是可憎的人物。他们的关系相当于妥欢帖睦尔憎恨图帖穆尔的关系<sup>(20)</sup>。但不过没发展到从宗庙撤除牌位的地步。这样,在不同的时期尊敬某人或者否定某人,是有具体规定的。

<sup>(16)</sup> 松川节:《大元ウルス命令文の书式》整理了在大元兀鲁思领域内发出的蒙古语命令文的格式(即是“大元兀鲁思书式”)。命令文为了表示自己的命令的正统性,列举先代诸皇帝的名字(41页)。在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等著作中收录了许多具体的例子。

<sup>(17)</sup> 《三场文选》的《圣朝科举进士程式》列举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后庙号和谥号,为“仁宗圣文钦孝皇帝”,“英宗察圣文孝皇帝”,“明宗翼献景孝皇帝”,“文宗皇帝”,“今上皇帝”,并列地写出各人的庙讳。这也证明元末的庙讳一览不列也孙铁木儿。另请参看陈高华于2002年11月发表的《元朝科举诏令书考》。

<sup>(18)</sup> 《元史》卷74《祭祀志三·宗庙上》。关于这两个事件的详细情况,见同书卷32《文宗本纪一》天历元年十月丁巳(《祭祀志》误作“丁亥”),及卷40《顺帝本纪三》至元六年六月丙申。

<sup>(19)</sup> 关于至正元年以后的对图帖穆尔的态度,请参看杉山正明:《元代蒙汉合璧命令文の研究(二)》(43页),和中村淳、松川节:《新发现的蒙汉合璧少林寺圣旨碑》(21页)。

<sup>(20)</sup> 在《三场文选》中,只写“文宗皇帝”而没有尊谥,是因为今上皇帝就是妥欢帖睦尔。没有懿璘质班的庙讳,或许跟决定庙号谥号迟到至元四年(1338)有关系。待考。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今上皇帝”是谁的问题。除了钱大昕推断的也孙铁木儿以外,和世球和文宗图帖穆尔兄弟俩也都有可能是“今上皇帝”。因为他们不承认也孙铁木儿本身的皇位继承权。很可能是他们从御名庙讳一览中删除了也孙铁木儿的御名庙号。其中,首先比较和世球与文宗图帖穆尔,和世球的治世太短,不可对各种政策反映自己的政治意思。也孙铁木儿因为是他自己送给英宗庙号谥号,所以在他的治世不会不写英宗谥号。综合考虑这三个人的状况就可以自然地看出编辑御名庙讳一览的时间是在文宗图帖穆尔的时代。

现在还要考虑《礼部韵注》附载的记事究竟是否反映了当时的政权的意图?《三场文选》所载的延祐元年的咨文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延祐元年 月 日,准中书省咨,礼部呈,翰林国史院经历司呈该,设科举事内一款,试卷不考格,犯御名庙讳,偏犯者非。照得考试格式已有定制。今依上检照御名庙讳,钦录在前。具呈照详。得此。本部参详,既翰林院史院(笔者注:即翰林国史院)定拟明白,拟合照依都省钦奉诏书事意定到条画,遍行照会,扎付本部,行移各处,钦依施行,相应。得此。除外,今将御名庙讳,钦录在前。都省合行移咨请照验依上施行。钦录到御名庙讳。

这是一份命令的摘要,即礼部对翰林国史院经历司的呈文经过慎重研究之后以呈文的形式向中书省报告,中书省根据礼部的报告以咨文的形式通知各个行省。从这个文件来看,随着延祐元年的科举再开,通知应该回避的御名庙讳<sup>(21)</sup>。即在此规定对各位皇帝和祖先应该使用哪个汉字的标准。由于这样的御名庙讳一览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可能是在皇帝即位或者是实施科举时通知有关衙门的。

《礼部韵注》的《圣朝颁降贡举三试程式》汇集整理了参加考科举试的人们所应该遵守的最低限度的规则。所以,其中的内容必须是正确的。换句话说,《礼部韵略》的出版是以在考场使用为目的的,所以它的庙讳一览,即使是坊刻,也必须反映政府的规定以及对各位皇帝治世的政治评价。尽管到了顺帝妥欢帖睦尔时代,还没有添入图帖穆尔以后的有关资料,这或许是跟行数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十三名的御名庙

---

<sup>(21)</sup> 《三场文选》在本文之后收录了御名庙讳一览。但是,这个一览有一部分的增补,收录的下限到妥欢帖睦尔。参看注(17)。





部分也列举了几乎同样的字样,这让人联想到在延祐末年的回避字样的有效性<sup>(24)</sup>。可是事实上这些规定是否得到遵守则是令人怀疑的。其根据是延祐年间连续发出的几件文书:

#### 回避讳字例

延祐元年,中书省咨,陕西省咨禀,科举事件,送礼部,约会翰林院官议得,拟作称贺表章,元禁字样大繁。今拟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於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都省请依上施行。

延祐元年,中书省咨,江浙省备国子监、翰林院、集贤院呈,今行贡举,例合回避庙讳,犯者不考。各路州县儒学月试,亦合回避。

延祐三年,中书省礼部呈,翰林国史院议得表章格式,除御名庙讳必合回避,其余字样,似难定拟。都省仰钦依施行。

这些咨文收录在几种元代史料中,其中包括《礼部韵注》的《考试程式》<sup>(25)</sup>。第一条的“元禁字样”大概指收录了一百六十多字的《表章回避字样》而言。这一条所规定的“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於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中所见的休字、祥字、极字、化字之中,除了祥字以外都包括在上述一百六十字之中。第二条的文书规定了各路府州县学实施的月试答案中所禁用的文字。但是,仅仅两年后的延祐三年,除御名庙讳以外的回避字样已被认为“似难定拟”(第三条),从这里知道前两条的规定除了御名庙讳以外实质上被取消了。

最后,剩下最低限度的《回避字样》是庙讳和御名,即关于避讳的规定。到现在为止,以清朝考证学的权威为主,许多学者们在提及元代的避讳规定的时候,都特别强调在大蒙古国初期御名无须避讳的原则。实际上,随着时代的推移,元代实施了与金代同样的关于回避御名庙讳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是非常宽松的。比如《回避字样》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全用御名庙讳”要回避,《三场文选》的引文部分也说:“试卷

<sup>(24)</sup> 《元典章》和《新刊韵略》的《回避字样》都用五字一套、三十二套的一览表形式。但是前者是三段,而后者是四段,顺序也有区别。《新刊韵略》所载的一览在双行注中有错。比如说,关于《元典章》陈垣所指出的“某字系旧式”和“某字近用不驳”的部分被弄成“系申式”和“近用可驳”。

<sup>(25)</sup> 《元典章》卷28的一百六十余字的《表章回避字样》后面有题为《表章回避字样》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与《翰墨全书》(389页)相同。《三场文选》收录有与《礼部韵注》完全一样的三条。

不考格,犯御名庙讳,偏犯者非。”<sup>(26)</sup>

那么,为了考生和判卷者而公布的御名庙讳一览,就必须规定在不不得写御名庙讳的情况下采用何种避讳的方法。至少可以确认实施了缺笔的规定。这个推测的根据之一是元统本《礼部韵注》中的御名庙讳一览。顺便说一句,元刻本《事林广记》的御名庙讳一览中也采用了缺笔的方法。明初的叶子奇关于元代的避讳有如下的论述:

讳法……,至于元朝,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后来虽有讳法之行,不过临文略缺点画而已,然亦不甚以为意也。初不害其为尊,以至士大夫间,此礼亦不甚讲<sup>(27)</sup>。

《礼部韵略》的庙讳一览上所见到的缺笔与叶子奇论述的内容一样,证明了元代的避讳的情况。至正本没有缺画。从这个刊本可知,因为《礼部韵注》不是表章,所以事实上不须避讳。尽管如此,元统本《礼部韵注》大胆地采用缺笔的方法回避庙讳。自从避讳非常严格的宋代以来,士大夫们已经养成了“回避御名庙讳”的观念。元代中期以后的士大夫也以考上科举为最大的目标。可以认为宋代以来的观念和习惯反映在元代士大夫的避讳行动上。

## 二 元代的韵书与类书

### (一) 《古今韵会举要》、《韵府群玉》与《礼部韵略》

提及元代编撰或出版的韵书,我们可列举出《蒙古字韵》和《中原音韵》等。这些书在语言学与音韵学方面都非常受到重视。但是现存数量最大的元代韵书是《古今韵会举要》。该书很可能是当时最脍炙人口的韵书<sup>(28)</sup>。学术界对该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特别从一九七〇年代后半起关于本书的专门论著增加得很快。研究题目的多样化也越来

<sup>(26)</sup> 《元史》卷 81《选举志一·科目》为主的数种史料中可以看到《科举条款》下的这一规定:“试卷不考格,犯御名庙讳,偏犯者非,及文理纰缪,涂注乙五十字以上。”

<sup>(27)</sup> 《草木子》卷 3 之下《杂制篇》(中华书局点校本,58 页)。

<sup>(28)</sup> 据熊忠自序后面所载的牌记来看,《古今韵会举要》非常流行,而书铺要采用盗版对策。“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

越明显<sup>(29)</sup>。最近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花登正弘的综合性研究。此外,还有从目录学和版本学的角度对该书进行分析的研究。这似乎可以说关于《古今韵会举要》的很多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sup>(30)</sup>。我在本章之中将试图探讨编撰《古今韵会举要》的目的,以及它与出版《礼部韵略》的关系。毋庸赘言,我不想直接涉及音韵系统的问题。

首先,参考已往的研究对《古今韵会举要》的编辑与出版经过做一个简要的说明。本书来源之一的《古今韵会》是南宋末年由进士黄公绍撰写的。根据刘辰翁为本书所写的序言可以知道,至元二十九年(1292)时《古今韵会》的编纂还没有完成。其后熊忠用《古今韵会》的注释部分,按照《礼部韵略》的收录字目编写了《古今韵会举要》。根据熊忠的自序,本书似乎成书于大德元年(1297)。

《古今韵会举要凡例》说明了本书的编辑方针。请看第一条:

一,礼部韵略,本以资声律便检阅。今以韵会补收阙遗,增添注释,凡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字。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本书的特征。熊忠将《古今韵会》的注释附在简便实用的韵书《礼部韵略》中,使得韵书和字书合为一体,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的方便。熊忠在自序中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谈到历代的韵书,指出由于唐末的科举科目中列有诗赋,所以专门制定礼部韵,在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宋代,科举所用的官制韵书规定了所有字音。他不满现实中有时甚至将经书上的文字看做是错字。他提到黄公绍编写的《古今韵会》:

同郡在轩先生黄公公绍慨然欲整千有余年韵书之失,始秤字书,作古今韵会。

熊忠认为黄公绍广泛地收集字目,加进很多注释。他对这一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sup>(31)</sup>。可是在谈到自己编辑的《古今韵会举要》时,他却否定了广采博收。

惜其编帙浩瀚,四方学士不能遍览。隐屏以来,因取礼部韵略,

<sup>(29)</sup> 1990年代以前的研究,请参看花登正宏:《古今韵会举要研究—中国近世音韵史の一侧面—》,0·2《序章,<古今韵会举要>研究略史》(8·38页)。

<sup>(30)</sup> 注(29)花登著作,及住吉朋彦:《(元)刊本系<古今韵会举要>传本解題—本邦中世期汉学研究のための—》。

<sup>(31)</sup> 《古今韵会举要》熊忠自序。《古今韵会》的编辑方针根据注(29)花登著作(8·83页)。

增以毛刘二韵及经传当收未载之字,别为韵会举要一编。

该书和《古今韵会》一样收录经书的注释文字,收录字目基本上按照《礼部韵略》系统进行增补<sup>(32)</sup>。同书卷一《上平声·一东·拢》:

案,……又兼礼部韵略承用既久,学者童习白纷,难以遽变。今但于逐韵各以类聚,注云已上属某字母韵。若贡举文字,事干条制,须俟申明,至于泛作诗文,无妨通押以取谐叶之便。

《礼部韵略》过于简便,而且分类方面有许多问题,但是本书的影响很大,绝对不能忽视。熊忠承认这个现实,根据实际情况着手编撰。以下对他采用这种编辑方针的背景,即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略作分析。当时政治和社会的动向与本书的成立问题之间,乍一看来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本书所依据的《礼部韵略》在宋金时代与科举有很密切的关系。若是我们考虑到与科举有关的政治和社会动向,就容易了解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sup>(33)</sup>。

《古今韵会举要》应该形成于大德元年。当时距南宋灭亡已经过了大约二十年,离金朝末年则已经超过六十年。在蒙古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的至元后期,施行科举的意见在整个中国无疑日益高涨<sup>(34)</sup>。当时,在成宗帖木儿即位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政府发表了振兴儒学的政策。当时许多士大夫将通过考试任命官吏的办法视为传统学术的最终目的,他们无疑认为科举即将施行。《古今韵会举要》的出现恰好就在这样的时候,可以说反映了时代的气氛。在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海山即位的时候,表示了对儒教文化的尊敬,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大三年(1310),政权命令将加封孔子的圣旨在全国的儒学勒石立碑<sup>(35)</sup>。另一方面,根据阴幼达等撰写的《韵府群玉》的序文,《古今韵会举要》的初版在延祐元年(1314)前后已经出现,这在时间上是与

<sup>(32)</sup> 同前注。《古今韵会举要凡例》(中华书局本,2000年,6页)韵例,第二到五条。

<sup>(33)</sup> 关于再开科举的政界内部的具体动态,以及士大夫各人的希望等,由于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在此恕不论述。

<sup>(34)</sup> 目前很多学者提及再开科举的过程。如梁庚尧:《宋元书院与科举》(678-679页),宫注(3)论文(8页)。

<sup>(35)</sup> 至元三十一年和大德十一年诏的评价,请参看森田宪司:《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儒学圣旨碑一石刻、〈廟學典禮〉、〈元典章〉一》,宫纪子:《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造〉をめぐる诸问题》。

恢复科举的年代大致相同的。毫无疑问,本书具有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大夫提供参考的性质,而且该书在元代的编撰和出版是以政府推行的文化政策为转机的<sup>(36)</sup>。

另外,涉及元代韵书时,不要忘记这部《韵府群玉》本身以类书的形式兼有韵书的性质。这部书籍在当时大量出版甚至影响到了同时代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了本书的出版与科举的开始有关<sup>(37)</sup>。本书作为类书不仅分类编辑各种各样的知识,同时具有韵书的性质,不难想像是提供给为考试而用功的儒生们作参考书用的。这部书的分韵当然是根据《礼部韵略》的。如果我们注视本书的编辑过程,就可以看出在决定施行科举的皇庆年间(1312-1313)以前,编辑本书的阴幼达等已经感到科举将要恢复和社会上对考试参考书的需要。而且,从本书的特点和编辑过程出发,又可以让我们在追寻韵书的不同系统互相发展的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对类书和韵书双方收录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sup>(38)</sup>。

综上所述,脍炙人口的《古今韵会举要》和《韵府群玉》均继承了《礼部韵略》的结构,并且增补了许多内容。这些书为考生提供方便,所以很可能有很多人使用该书。这些书在当时出版流行,而且作为韵书的《礼部韵略》依据的《广韵》、《集韵》也存在于当时。实际上《礼部韵略》的出版一直持续到元末,有许多刊本流传至今。但是,《礼部韵略》的内容过于简略,即使被《古今韵会举要》等书完全取代也是毫不奇怪的。下一节中将叙述这种现象出现的背景。

## (二) 元代的《礼部韵略》的流行与科举制度

宋代第一次制定了包含回避字例的科举专用韵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60,真宗景德二年(1005)七月丙子,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

<sup>(36)</sup> 根据现存刊本所载的学术鲁翀序和余谦记,可知元统三年儒学提举余谦曾经试图出版该书,但不清楚实际上是否出版。这个版本没有留下来的原因,或许是与同年科举被中止有关。

<sup>(37)</sup> 参看住吉朋彦:《〈韵府群玉〉版本考》(一)(342-343页)。

<sup>(38)</sup> 注(9)拙稿上探讨《事林广记》与《新刊韵略》的俗字规定是大概同样的。

近年,进士多务浇浮,不敦实学,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廷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旧敕止许以篇韵入试。今请除官韵略外,不得怀挟书策。令监门巡铺官潜加觉察,犯者即时扶出,仍殿一举。

这一建议得到皇帝的认可<sup>(39)</sup>,景德四年,《广韵》的编者们受命编撰了《景德韵略》。由此可以知道在《礼部韵略》的系统中最早编纂的韵书原来是以带进考场为前提编纂的。这就是说,《礼部韵略》一开始就具有与他考试参考书不同的特点,即不仅在准备考试时使用,也可以考试中使用。

在元代考科举试时,也许可携带《礼部韵略》进入考场。但是元代科举考试中几乎根本不存在考试音韵知识的科目。对于“蒙古·色目人”来说没有必要考韵文的诗赋科目。而对于“汉人·南人”来说,在第二场必须从“古赋”、“诏诰”、“章表”中选择一个科目。无论他们选择什么科目,都与审音考韵的“律赋”不同,不考音韵知识。而且现存的《新刊韵略》和《礼部韵注》中收录的文字至多在一万左右。考生如果具有在“经疑”、“经义”等其他科目上取得好成绩的基础知识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认为他们在写作古赋方面所需的音韵知识很可能是有限的<sup>(40)</sup>。尽管如此,《礼部韵略》持续流行的最大原因无非是元代的考试规定,即考生与宋代时一样可以携带《礼部韵略》进入考场。即使是博学多识的考生也不敢不携带被许可的参考书下场。大部分的考生为了自己携带参考书下场而购买本书。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书铺持续出版《礼部韵略》的理由。

现在可以确认的在书名中带有《礼部韵略》或者在内容上被认为是属于《礼部韵略》系统的书籍达十几种以上。关于大蒙古国统治时期出版的平水韵,可以举出元朝成立以前的1229年《新刊韵略》,1252年《壬子新刊韵略》以及大德四年(1300)梅溪书院本《排字礼部韵略》<sup>(41)</sup>。但是,这些刊本都已经佚失了。在现存刊本中,《新刊韵略》

<sup>(39)</sup>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6年,524页)。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后集卷36所引。

<sup>(40)</sup>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2记载为了作成古赋必须学习的项目。

<sup>(41)</sup> 延世大学校所藏木版刻本《排字礼部韵略》是有刊记“大德庚子良月梅溪书院刊行”的覆刻本。关于详细的情况,请参看赵复衍:《排字礼部韵略の

问世最早,该书是在大德至延祐年间出版和增补的<sup>(42)</sup>。当时,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振兴儒学的政策。如上所述,承继了上述平水韵的《礼部韵注》现今保留有元统三年(1335)和至正十二年(1352)刊本<sup>(43)</sup>。另一方面,关于南宋以来代表《礼部韵略》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以下略为《增韵》)的系统,可以举出至正四年余氏勤德堂本(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日本翻刻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至正十五年陈氏余庆堂本(静嘉堂文库和宫内厅),至正十五年日新书堂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国立故宫博物院、内阁文库),至正二十一年兴庆书堂本(上海图书馆),至正二十六年秀岩书堂本(国立故宫博物院)<sup>(44)</sup>。诸本的现存状况说明了《礼部韵略》被多次付诸重刊的事实。至治到至顺年间的刊本没有留下来的原因,既有《古今韵会举要》和《韵府群玉》出版的影响,也有总体说来的出版数量的变化的影响<sup>(45)</sup>。上述情况至少可以说明是到了元末时,各种《礼部韵略》作为科举必须的小而全的韵书被大量出版上市。

那么,当时的考生在大量上市的《礼部韵略》中选择哪种刊本呢?印刷好错误少的刊本肯定是受欢迎的。另外,像《礼部韵注》那样载回避字样和俗字事例的参考书,不仅在考场也可以在准备考试时使用,可以受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南宋以来流行的《增韵》留下很多至正年间刊本,而北方系统诸本的至正刊本现存不多。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北方本的注释不多,或者是当时的士大夫普遍认为《增韵》的比较好。

---

小考—书志学的인 側面에서》(49-50页)。梅溪书院刊行了许多其他准备考试的书籍(请参看潘国允、赵坤娟:《蒙元版刻综录》(125-126页)和宫注(3)论文的注第24)。

<sup>(42)</sup> 据牌记“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可知出版于大德十年(1306),据本稿第一章第一节可知于延祐七年(1320)增订再版。

<sup>(43)</sup> 注(10)提及的《魁本排字礼部韵注》有后至元元年(1335)德新书堂本及至正年间明州梅隐书院刻本。潘注(41)著作(126,180页)。

<sup>(44)</sup> ( )内的所藏单位仅限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35-466页),《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丛目·上》1983年(166-167页)等。参考天理图书馆善本书汉籍之部编集委员会:《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松尾良树《解题》及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A 62-65, B 36, C 5-57, D 24-27页),阿部:《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389-394页),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64-65页)。

<sup>(45)</sup> 实际上当时的文章中引用《韵会》的也不少。但是,在涉及音韵时引用《韵略》的比较多。所以不能说《韵会》替代了《韵略》。



无论如何,属于北方系统的平水韵在由金朝转为蒙古政府以后在华北再版,作为标准一直被使用着。随着科举即将被恢复,它和南方重版的《增韵》一同避免了被废除的命运,直至元末被多次重版。《三场文选》《圣朝科举进士程式》延祐元年六月某日中书省咨中有如下一款:

乡会等试许将礼部韵略,讲议得,即目南北刊行礼部韵略,因在前避讳字样增减不同,今来科举既开,未审用何本为主。合从都省颁降,庶得归一。前件议得,科举许用见行礼部韵略外,据金宋避讳字样不须回避。

根据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元代科举开始时,当时通行的南北双方的《礼部韵略》都可以使用,并没有限制其中的某一种<sup>(46)</sup>。关于其后的情况,无疑应该避免主观臆断,但是从至正初期的两种系统的刊本并存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推断许可携带下场的《礼部韵略》到最终也未能统一。

本稿主要探讨了元代的避讳问题和科举的开始与韵书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元代科举不是像从来所说的那样到了皇庆年间政府突然做出的决定,而是从至元末年随着振兴儒学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变成现实的。这是从官僚们关于再开科举的言论,以及政权怎么处理这些言论都难以发现的事实。但我在本稿仅仅以应该有效利用的《礼部韵注》为主要的探讨对象,对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上所述,最近对科举问题的研究超越了历史学、文学与版本学的界限,进行着综合性的研究<sup>(47)</sup>。关于科举的诸多问题,我们必须在历史学和音韵学等方面做更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一览】

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汲古书院,1976年。

——:《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汲古书院,1993年。

<sup>(46)</sup> 富注(3)论文的注第18和第78。

<sup>(47)</sup> 刘祥光的研究概括性地说明了宋代与科举有关的书籍的出版情况(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如果将他探讨的宋代情况应用元代科举研究,一定是更有意义的。

-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
- 陈高华:《<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的一点补充》,《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187-188页。
- :《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一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2001年,342-372页。
- :《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暨南史学》第1辑,2002年,153-171页。
- 陈垣:《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
- 赵复衍:《排字礼部韵略の小考—书志学的側面에서》,《奎章閣》4,1981年,49-69页。
- 《元代の社会と文化》研究班:《<事林广记>刑法类、公理类译注》,《东方学报》第74册,2002年,257-309页。
-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 花登正宏:《古今韵会举要研究—中国近世音韵史の一侧面—》汲古书院,1997年。
- 平田昌司:《<广韵>与<集韵>—科举制度与汉语史第五》,《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年,81-100页。
- :《科举制度と中国语史》,《古典学の再构筑—20世纪后半の研究成果总括と文化横断的研究による将来の展望—》第7号,2000年,54-60页。
- 黄仁生:《论元代科举与辞赋》,《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109-121页。
- :《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覆》,《文献》2003年第1期,95-105,177页。
- 梁庚尧:《宋元书院与科举》,中国史学会编《中国の历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发展》(第一回中国史学国际会议研究报告集),东京都立大学出版会,2002年,649-689页。
- 刘祥光:《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7期,2000年,57-87页。
- 松川节:《大元ウルス命令文の书式》,《待兼山论丛》第29号史学篇,1995年,25-52页。
- 宫纪子:《大徳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诰>をめぐる诸问题》,《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4号,1999年,135-154页。

- ：《<对策>の对策—大元ウルス治下における科举と出版—》，《古典学の现在》V(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古典学の再构筑>总括班)，2003年。
- 森田宪司：《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儒学圣旨碑—石刻、<庙学典礼>、<元典章>—》，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403-435页。
- ：《元朝の科举资料について—钱大昕の编著を中心に—》，《东方学报》第73册，2001年，157-184页。
- ：《石刻资料による元代汉人知识人社会の研究》平成10~1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2002年。
- 中村淳、松川节：《新发现の蒙汉合璧少林寺圣旨碑》，《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Ⅷ，1993年，1-92页，图版8枚。
- 宁忌浮：《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中华书局，1997年。
- 潘国允、赵坤娟：《蒙元版刻综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
- 櫻井智美：《<礼部韵略>与元代科举》，《元史论丛》第9辑，待刊。
- 杉山正明：《元代蒙汉合璧命令文の研究(三)》，《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Ⅵ，1991年，35-55页，图版2枚。
- ：《大元ウルスの三代王国—カイシヤンの夺权とその前后—(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34，1995年，92-150页。
- 住吉朋彦：《〔元〕刊本系<古今韵会举要>传本解题—本邦中世期汉学研究のための—》，《日本汉学研究》1号，1997年，1-150页，图版55枚。
- ：《<韵府群玉>版本考》(一)、(二)、(三)，《斯道文库论集》第35辑(2001年，335-430页)，第36辑(2002年，403-446页)，第37辑(2003年，199-252页)。
- 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编集委员会：《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8，天理大学出版部，1982年，松尾良树《解题》。
-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萧启庆：《元延祐二年与五年进士辑录》，《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375-426页。
- ：《元至顺元年进士辑录》，《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2期，2000年，179-204

- 页。
- ：《元泰定元年与四年进士辑录》，《蒙古史研究》第6辑，2000年，58-82页。
- ：《元至治元年进士辑录》，《宋旭轩教授八十荣寿论文集》同论文集编辑委员会，2000年，755-782页。
- ：《元至正前期进士辑录》，《燕京学报》新10期，2001年，173-208页。
- 张渭毅：《〈集韵〉研究概说》，《语言研究》1999年第2期，1999年，129-153页。
-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1991年。
- （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

#### 【附记】

原载：岩井茂樹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報告論文集《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2004年刊行予定。

此次，根据得到文部科学省“21世纪COE工程”重点资助的本研究会的研究计划，在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伍跃的指导下完成了本论文的中文译本，在此谨致谢忱。并借此向在东京、北京和台北为我查阅资料提供方便的有关机构和诸位先生表示感谢。本稿亦是平成十五年度(2003-2004)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别研究员奖励费)的成果之一。